

曾国藩 与 近代中国

王继平 李大剑 主编



曾国藩 与 近代中国

王继平 李大剑 主编



岳麓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国藩与近代中国/王继平,李大剑主编. —长沙:

岳麓书社,2007

ISBN 978 - 7 - 80665 - 952 - 6

I. 曾... II. ①王... ②李... III. ①曾国藩(1811 ~ 1872)—人物研究—文集②中国—近代史—文集

IV. K827 = 52 K250. 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3851 号

曾国藩与近代中国

主 编:王继平 李大剑

责任编辑:曾德明 吴 茵

封面设计:胡 颖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 1092 1/16

印张:37.75

字数:800 千字

ISBN 978 - 7 - 80665 - 952 - 6/K · 251

定价:60.00 元

承印: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4129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许嘉璐先生 致本届学术研讨会的贺信

(代 序)

‘2006 双峰国际曾国藩学术研讨会组委会：

欣闻‘2006 双峰国际曾国藩学术研讨会召开，很想附骥学习，但工作日程早已排定，不能分身，只好抱憾写此短信向大会表示衷心的祝贺！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先秦以迄两汉，湖湘是楚文化的重要地区，为中华民族形成多元一体的伟大文化有过极其重要的贡献。近世，湖湘文化又形成了一个超越唐宋令世人惊叹的高潮，形成了“经世致用”的深厚传统。作为这一传统的代表人物，曾国藩不但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中华文化传统的维护者、实行者和推广者，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对曾国藩学术思想做历史的、辩证的、科学的研讨，必将有助于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史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有助于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新起点上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创造新的先进文化。

祝此次研讨会圆满成功！

许嘉璐

2006 年 11 月 29 日于成都

目 录

1. 事实评判与价值评判之间的历史相关性分析	郭世佑 (001)
——关于曾国藩历史认识纷争中的方法论问题	
2. 《湘军史》架构与曾国藩研究若干问题浅析	王 盾 (008)
3. 曾国藩故居富厚堂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述论	李大剑 (013)
4. 曾国藩对湖湘文化的贡献	唐浩明 (017)
5. 论曾国藩的圣人思想	李育民 (021)
6. 以学术为治术	
——曾国藩的礼治思想及其经世实践	朱汉民 吴国荣 (037)
7. 曾国藩的政治思想与实践	唐诗戡 (043)
8. 曾国藩的士大夫之学与其开展的内在逻辑	柳春蕊 (047)
9. 论曾国藩的革新开放思想	彭爱华 郭萼球 (059)
10. 由曾国藩的理想人格追求谈“内圣外王”的局限与价值	向学力 (065)
11. 从曾国藩与佛教的关系看曾国藩出世与入世互融的思想渊源	曾琦云 (069)
12. 曾国藩经世致用思想研究	曾天雄 罗海云 (077)
13. 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初探	张 凡 (085)
14. 曾国藩和谐思想浅析	曾益民 曾伯怡 (094)
15. 曾国藩廉政文化初探	袁若宁 (099)
16. 曾国藩创建理想和谐家族社会思想	朱钟颐 刘艳雄 (103)
17. 曾国藩“将领中心制”治军思想的历史评价	郑 汕 刘利勤 (110)
18. 曾国藩和晚清军事变革	史滇生 (115)
19. 曾国藩治军思想与近代军队建设	华 强 (122)
20. 曾国藩的治军方略与毛泽东军事思想探源	薛学共 (129)
21. 曾国藩治军方略刍议	黄顺力 (137)
22. 试论曾国藩的军事改革	张 伟 薛学共 (148)
23. 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两个问题	孙映球 (155)
24. 曾国藩军事战略辩证法论略	姜正国 朱耀斌 (160)

25. 曾国藩的人与武器思想研究 母春生 薛学共 (165)
26. 程朱理学与湘军集团 张昭军 (177)
27. 楚勇、湘勇与湘军的初建 丁平一 (189)
28. 湘勇形成前夕湘乡县的宗族婚姻关系
——以双峰县荷叶地区为中心 (日)河野吉成 (194)
29. 曾国藩与湖南军功绅士群体的兴起 许顺富 (208)
30. 书生立武勋
——湘军成功的内在因素 李志茗 (215)
31. 试析曾国藩人才思想与现代行政人力资源管理 张向前 (228)
32. 论曾国藩的行政管理思想与实践 罗依平 (236)
33. 浅析曾国藩的人才观 朱坚真 汪树民 (242)
34. 曾国藩经济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阶段性特点 李文斌 李安祥 (248)
35. 试论曾国藩的外交观 李传斌 (256)
36. 曾国藩的“羁縻驭夷”思想与晚清外交 贺 鉴 汪 翱 (263)
37. 曾氏父子外交之比较 张立真 侯 爽 (272)
38. 曾国藩与扬州教案 池子华 (277)
39. 论曾国藩的现代化意识及其意义
——兼论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路向 王继平 (280)
40. 曾国藩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刘云波 (287)
41. 曾国藩与中国近代先进文化 徐泰来 (294)
42. 简析曾国藩学习、引进西方近代科技的必然性与被动性 文 瑶 (303)
43. 曾国藩科技思想成因探究 辛 松 (310)
44. 曾国藩的人文修养与中国近代科技的起步 张 超 (318)
45. 略论曾国藩开其端的近代军阀幕府 张学继 (325)
46. 曾国藩幕宾入幕变项析论(1853—1872) 凌林煌 (334)
47. 曾国藩幕僚中的新型知识分子 (日)仓田明子 (355)
48. 地方史料《潭城纪事》的发现
——兼述湘军与太平军的湘潭之战 何歌劲 (363)
49. 曾国藩佚信一通并论其相关情事 董丛林 (368)
50. 谭嗣同殉难和我祖父的死
——关于我祖父死因的考证 曾宪枢撰 曾光整理 (373)
51. 《曾国藩致黄赞汤函》析 吴 胜 (374)
52. 从《湘勇源流记》探湘军之兴起 宋建明 朱金云 (377)
53. 湘乡团练与湘军:源与流 李文洪 (382)
54. 曾国藩与倭仁关系论略 李细珠 (385)
55. 从薛福成“以夷制夷”思想看其与曾国藩的师承关系 周锦涛 (393)
56. 学术调融与思想改良
——曾国藩、郭嵩焘的礼学思想述论 罗检秋 (400)

57. 吴汝纶文论思想矛盾处考析

——兼论曾国藩对吴汝纶文论思想的影响 黄 伟 (409)

58. 湖湘一脉

——从王夫之到曾国藩再到蔡和森 李志和 (415)

59. 曾国藩和他的亲信史家

——从清末到民初太平天国起源传说的形成过程 (日)水盛凉一 (421)

60. 曾国藩治理直隶探略 迟云飞 (433)

61. 曾国藩金陵史迹考述 刘 刚 (442)

62. 曾国藩家训与家族管理 刘鹏佛 (447)

63. 寒素·勤勉·笃学

——曾国藩的家风 王向东 (456)

64. 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刍论 谢祥清 杨曼英 (458)

65. 论曾国藩之子女职业生涯规划与设计思想 梁贵超 (463)

66. 论曾国藩家教思想的来源、内容与方法 王佩良 饶怀民 (472)

67. 从曾国藩的收藏实践看档案思想的形成与完善 王跃平 王泉初 (483)

68. 文正公与曾氏南宗考 曾昭演 (487)

69. 曾国藩书学观 陈白羽 (490)

70. 曾国藩书法简论 李季琨 (497)

71. 曾国藩的书论、书法及其他 左立诗 (506)

72. 曾国藩诗歌创作简论 孙海洋 (513)

73. 曾国藩的心理学 李绍崐 赵 然 (518)

74. 试探曾国藩的养生之道 罗绍志 (521)

75. 湘水余波:王闿运与他的《湘军志》 刘绪义 (528)

76. 曾国藩与《船山遗书》 胡卫平 彭剑平 王 勇 (535)

77. 曾国藩与晚清书院的复兴 彭小舟 (545)

78. 曾国藩的养心之道 蔡 群 范忠亮 (553)

79. 曾国荃生平简论 梁小进 (557)

80. 曾纪泽与西学东渐 方红姣 (564)

81. 近百年来曾国藩幕府研究述评 成晓军 崔志远 (570)

82. 近十年中国大陆曾国藩研究综述 刘志靖 (580)

83. '2006 双峰国际曾国藩学术研讨会综述 郑大华 尹晓奔 (590)

编后记 (592)

事实评判与价值评判之间的历史相关性分析

——关于曾国藩历史认识纷争中的方法论问题

郭世佑

“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①按理说来,史料的考证是事实评判的基础,事实评判又是价值评判的基础,对史实重建的投入越多,种种关于价值评判的争论也就不难迎刃而解,只要先在事实的层面把问题弄清楚,回答好“是什么”,然后分析“为什么”,关于“怎么样”的价值对话就该水到渠成,因为“历史认知的先决条件被称作真实的客观性,它被明确化为第一手资料与解读的一致性”^②,用法国历史哲学家克里斯特勒的话说,“历史解读的有效性并非得自于认可它的学者的权威性,亦非源于与传统观点或当前趋势的一致性,而是取决于对第一手资料,也就是过去的原始文本和文件,是否保持一致”^③。然而,历史研究中的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事实的探究需要对史料的占有与辨别下工夫,不便轻易涉足,还不大容易对别人指手画脚或讨价还价,价值的评判却往往变成最容易说话的领域,好像只要愿意,谁都可以借助于各自所掌握的史实,根据各自的视角、旨趣或史观,对某些历史人物、事件与现象评头品足,加上我国的史学传统就有讲究“一字之褒贬”的春秋笔法,看重所谓“盖棺定论”,久而久之,学界的价值评判也就成为谁都可以见仁见智的公共领域,形成老少皆宜的公共话题。唯其如此,少数专业研究者则干脆搁置此题,力避其烦恼者有之,不屑一顾者亦有之。

回避问题自然不是办法,对某些重要历史人物的价值评判就是在梳理历史进程的整体脉络与得失区分中展开的,而拷问价值,将知识提升为心灵的智慧,普及大众,本来就是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或“文化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④。某些空泛的价值争论则难以缩小争论的范围,任何行之有效的学术研讨都需要归纳论据,找出分歧焦点,收求同存异与求异存同之效。

近30年来,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社会实践既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也改变了国人的历史观念,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选题与视野,那种把近人曾国藩倡导的“洋务运动”当作贬义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看来,主动打开国门之后,由千百万人参与的社会实践对自身历史认识的显著变化,以及对意识形态的良性影响,远比坐而论道的学术研讨会更能解决某些学术争端。正如恩格斯所说:“包罗万象的、最终完成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认识的体系,是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但是这决不排斥,反而肯定,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得到巨大进展的。”^⑤

历史与现实的互动总是不期而至,二者的因果链拉得越长,史学主体的某些主观好

恶也会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而变化,价值评判体系也将随之调整。不管人们以前对“洋务运动”的定性分析与价值评判如何,也不管人们对克罗齐的历史观是赞美还是轻视,但几乎都在不知不觉地用自己的行为证实克罗齐这位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兼历史学家所提出的一个命题:“每一种真正的历史都是现代史。”^[6]

不过,现有的社会实践还不曾完全解决评判曾国藩的某些瓶颈因素。

1995年11月,在湖南双峰县举行的全国性首届曾国藩学术研讨会上,关于曾国藩究竟是“过大于功”,还是“功大于过”^[7],就成为彼此争论的一个焦点。在此会的闭幕式上,笔者曾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二者都存在思维误区:所谓“功”、“过”之大小定量毫无科学依据,无法构成坐标尺上的正、负值,争论双方虽然都想说服对方,结果谁都说服不了对方。如果以为历史人物的“功”与“过”可以加减,甚至可以抵消,那只是一种错觉,是科学主义对人文学科的束缚所致^[8]。十一年过去了,学界关于曾国藩的研究仍在延续,事实评判与价值评判仍在分歧中进行。

窃以为,影响对曾国藩作价值评判的,主要集中于两个史实渐清的事件:一是曾氏对太平天国的武力征服,二是他在处理天津教案时的对外妥协。前者源于某些定性的误断,后者则需要像近代德国哲学家狄尔泰所主张的,来一点“同情的理解”,二者都需要在事实评判与价值评判之间,加强对历史的相关性分析。而无论是曾氏的言行取舍,还是太平天国的成败,都存在许多复杂的相关性因素。

人们常说历史不能假设,但又无法完全摒弃和跳出假设的思维,去深究某种既成事实背后的多种可能性,考察各种变量,寻找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相关性,展示历史变化的“合力”景观,而不是把历史事实与历史必然性画等号,为宿命论作注解。既然如此,在如何看待曾国藩征服太平天国与处理天津教案的问题上,我们也不妨追问一下:曾国藩如果不那样做,究竟还有多少可供选择的历史空间?有多少更为理想的历史结局?倘若论者置身于曾国藩的境遇,又将如何选择?通过彼时的可能性考察与此时设身处地来自问两个层面的假设,再看曾国藩的错与罪究竟在哪,有多少,或可有助于减少对历史人物的苛责,尽量避免“把我们所熟悉的东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变了古人”^[9]。

如果没有曾国藩所统帅的湘勇及时直逼洪、杨起义军,清朝政权可能就被后者摧毁了,这是后世史家与当时的舆论所公认的。问题在于,战争的胜负总是事关双方。如果没有曾国藩的阶级罪恶,政教多元、危机四伏的太平天国究竟能延续多久,也就是说,太平天国自身有无失败的必然性因素?或然与必然之间的话语时空总是耐人寻味的。

面对清朝统治者征服太平天国起义军这一成案,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情感与立场都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代表劳苦大众的被征服者一边,历史的正当性得以充分体现。在对曾国藩的镇压之举作出合乎情理的定性分析时,似乎还有以下几个层面的问题值得重新推敲:

第一,绞杀太平天国起义者是不是曾国藩个人的错?如果是,他错在哪?如果不是,错在何方?

第二,太平天国能否避免镇压而拥抱胜利?

第三,太平天国应不应该被镇压?

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应该属于必然的范畴。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者的反抗斗争,如同

被统治阶级在忍无可忍时对统治阶级奋起反抗,二者都是正常的现象,这与其叫“阶级局限性”,还不如叫阶级本能,还谈不上是谁的错。曾国藩作为清朝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如果不愿参与镇压,而是隔岸观火,必将被统治集团治罪,至少是边缘化。若从历史的相关性来看,如果不是曾国藩对洪、杨集团镇压得最好,他就当不了举足轻重的封疆大吏,封不了侯,也就难以在顽固守旧势力遍布朝野时,力排众议,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发起所谓“洋务运动”,把近20年前魏源、林则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付诸实践,开启机器生产的时代,其影响可谓深远。历史研究的任务不仅要把对历史人物的价值评判严格建立在事实评判的基础上,更要尽可能说明历史的相关性与复杂性。

第二个层面的问题置于或然与必然之间。即使没有曾国藩为朝廷卖命,当节节溃败的清朝统治者喘过气来之后,洪、杨集团恐怕也无法避免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无情追杀。就凭洪、杨之间的内讧,凭借洪秀全对石达开、李秀成的猜忌与排挤,自毁长城,他们也很难支撑长久。既然如此,如果过多地埋怨或指责曾国藩对太平天国的镇压行为,其必要性就需要稍加推敲。

第三个层面的问题属于应然的范畴,比较复杂,它事关太平天国历史正当性的重新审视与确认。

历史唯物主义毫不含糊地肯定下层劳苦大众奋起反抗的历史正当性;历史辩证法则关注起义的变化过程,关注起义的政权性质是否发生蜕变,历史正当性如何不因历史对象的蜕变而发生迷失和转移。还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究竟能给广大下层民众带来多少实际的利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广大下层民众的利益。

倘若从历史条件与事实出发来解读历史,是否就属于列宁所批评的那种“客观主义”,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在列宁看来,光有事实还不够,还需要立场,即阶级立场。他说:“客观主义者谈论现有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唯物主义者则是确切地肯定现有社会经济形态和它所产生的对抗关系。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件的必然性时,总是会站到为这些事实做辩护的立场上;唯物主义者则是揭露阶级矛盾,从而确定自己的立场。”他还说:“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10]列宁所说的党性原则,即“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也就是劳苦大众的立场。如果将列宁的原则用于明摆着的现实斗争中,那是不难操作的。如果用于解读与评判已逝之历史,特别是错综复杂的近代中国历史,如何站在“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就不是那么明白无误了。

在评判曾国藩与洪秀全之间的成败与是非时,就不太容易把握这种阶级立场。这是因为,揭竿而起的洪秀全一班人在定都南京(天京)前后,就已明显地脱离广大民众,过起小朝廷的生活,这与腐败的清朝并无实质性的区别。例如,素为史家所重视的《天朝田亩制度》虽有关于平均主义的甜蜜承诺,却不过一纸空文,并未给广大农民带来实际利益。用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话说:“他们攻打一个又一个城市,靠掠夺和征收的物资过活,跟皇家军队差不多。”^[11]军营内外随处可见的并非其乐融融的平均主义,而是等级制、特权与酷刑。从金田起义之时的“男行”、“女行”,到问鼎金陵后的“男营”、“女营”,洪、杨等人不准一般起义者过正常的夫妻生活,违者皆斩,对“老兄弟”尤施点天灯的酷刑,他们自己却妻妾成群,而且美其名曰上帝的旨意。所谓“今上帝圣旨,大员妻不止”^[12],“天定多少听

天”^[13],便是洪、杨的主意。据访问过天王府的英人富礼赐记载,洪秀全还令各王多纳姬妾以庆祝他的寿辰,说:“亚当最初只娶一妻是很对的,但我现在知识更多,故叫您们各娶十妇。”^[14]洪秀全连吃饭都要敲锣打鼓,肆意铺张,出行坐轿更是讲究排场,等级森严。洪秀全有64人抬的龙凤黄舆随时伺候,杨秀清的大黄轿也要48人抬,连最基层的小官两司马也要4人抬。一个还没站稳脚跟的新式政权就已如此腐败,较腐败的清朝尤有过之。

洪秀全的腐败早在经营广西时就已开始。毕生致力于太平天国史实考据的罗尔纲就指出过:“他当初起义驻军桂平石头脚时,就立了十五个后宫,到东乡建国,就增立三十六个后宫。到建都天京,再增立八十八个后宫。”^[15]尽管洪秀全提出过“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但只要查看他那大白话式的500首宫廷诗,看看他对后妃定下的苛规就明白,他的言与行是完全分裂的,就连起眼看丈夫都是犯罪,需要严惩,甚至还有妃子被点天灯。关于南京内外参与各王府的土木工程与工程建设者的惨境,许多史书都有记载,洪秀全等人已经由昔日农民起义的领袖迅速蜕变为与下层民众迥异的军功贵族,是典型的政治暴发户,他们的阶级属性已经发生转移。如果后世研究者一味地站在洪秀全与太平天国的立场为之辩护,就无法确保站在下层民众的立场与公正的立场了。读者自有理由怀疑,如果仍然坚持为洪秀全等腐败者辩护,有何必要?历史辩证法难道不应坚持用动态的眼光盯住历史演化的全程?

况且,太平天国是一个宗教与巫术迷信相杂糅,思想混乱,言行不一,还任人唯亲、生活腐败较清朝统治者尤有过之的神权王国,其平均主义政纲的空泛性决定了它的政治动员是有限的,它对传统文明的虚无态度与对西学的一知半解,还有可共患难却很难同欢乐的内部危机,决定了它无法引领中华民族承担起“师夷”的历史重任,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却是近代中国的根本出路所在。凭借洪秀全的那点学识与魄力,他也不会比曾国藩在“师夷”的道路上走得更快、更远和更稳,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冯友兰曾经指出:“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但所要学习的是西方的宗教,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这就与近代维新的总方向和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背道而驰了。”^[16]冯友兰对太平天国神权政治的批评不是没有根据的。

更何况,摆在近代史研究者面前的,除了近代阶级利益的格斗,还有国家利益的得失,而国家利益往往是先于阶级利益和高于阶级利益的。国家利益的得失事关国内各阶级各集团的大局,如果阶级格斗的结局姗姗来迟,国家的利益却早就为强悍的西方列强所侵占,阶级格斗的胜者无论怎样爱国,要想再从列强手中索回,不啻虎口取食,谈何容易。西方列强不仅手持自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所形成的战败国赔款条约制度,而且还有热兵器时代的武力后盾。

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华门户洞开,晚清之后的历史异常复杂,历史的进程早已不是单方面的力量所能决定的了。即使洪秀全、杨秀清不腐败,不内讧,他们所面临的对手,除了掌握国家机器的清朝政府,还有随时觊觎中国的西方列强。洪秀全的政治素质与能力要比刘邦、朱元璋逊色得多,但所遇到的对手比刘邦、朱元璋时代要复杂得多,也强悍得多。即使刘邦、朱元璋再世,恐怕也难免捉襟见肘。即使新生的天国政权的腐败不比清朝政府整体上的腐败突出,那也需要通过决战,尽快解决国内的政治格斗,然后励精图治,督率国人一致对外,尽量避免西方列强的趁火打劫。英法联军趁中国内战发起新的侵略攻势,

俄国政府更是火中取栗,侵占我国大片领土,便是明证。

可见,当洪秀全等人从农民起义者迅速蜕变为腐败的特权者与军功贵族之后,历史的正当性问题就需要重新审视,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学术“立场”就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以免不自觉地背离劳苦大众,不要一切都以太平天国的是非为是非。在西方列强虎视眈眈的近代历史条件下,国家不容长期内战,也无法指望洪秀全一班人去开启救国救民的道路,清朝在籍侍郎曾国藩全力征服太平天国之举能否构成他对国家对民族的历史罪恶,能否成为对他进行价值评判的重要筹码,还需要通过考察太平天国的诸多历史相关性因素,予以重新推敲。

至于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一事,也不应成为对曾氏进行价值评判的思维障碍。

在近代中国,在处理中外关系时,由于国势渐微,中外悬殊明显存在,往往出现战、和两难,乃至进、退失据,加上同治、光绪也罢,慈禧垂帘也罢,专制朝廷并无定见,有权力却无责任,许多任事者却只有责任,并无权力,更无可以抗争的武力后盾,常常很难找到一个既能满足广大民众与言官舆论的抗争要求,又不至于激发新一轮外交冲突的两全之策,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便是一例。

发生于1870年的天津教案,是一个打死法、英等国教士、商人共20人的涉外事件,举世为之瞩目。如果有人以为此事一听起来就能令人振奋,以为这就是近代反帝爱国斗争的丰硕成果,那就未必了。资料表明: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带病赴津的直隶总督曾国藩左右为难,已抱一死之念,连遗嘱都已拟就。他在交代后事时,就向纪泽、纪鸿二子袒露:“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17]甫抵天津之初,曾氏迫于法、英等国军舰恫吓的压力,听从崇厚的主张,准备严惩肇事凶手,也同意提解天津知府张光藻与知县刘杰,“不得不勉从以全大局”^[18]。当他反复调查,审遍“凶犯”,发现还找不到那么多“正凶”,只准备拿出11人来搪塞洋人,但朝廷不允,不断逼曾多交,以免列强之怒。法、英等国政府则不满于他的拖延,向清朝政府提出抗议,施加压力。当曾氏奉命将知府、知县和提督陈国瑞一同提交刑部时,自知“内负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远近皆将唾骂,而大局仍未必能曲全,日内当再有波澜。吾目昏头晕,心胆俱裂,不料老年遭此大难”^[19]。稍后,当刑部判决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贬戍黑龙江时,曾国藩觉得定刑过重,就设法为张、刘筹集一万五千两银子,以为其刑途开销与赎刑之备^[20]。对于天津教案,曾国藩既妥协过,也力争过,经历了一个由妥协到反悔与设法抗争的过程。资料表明,一味妥协的不是曾国藩,而是慈禧为首的最高统治者。^[21]如果曾国藩完全听从天津民众与全国舆论的激进主张,同法国政府与西方舆论对抗到底,必将引起新的外交争端^[22],顶多在免职时获得一个让社会舆论与后世所赞叹的爱国名声,但无补于事,最受损害的还是国家的利益,任何外交抗争中的取胜都不是凭空实现,需要以国力为后盾。应当注意,法国伙同英国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原因之一就是西林教案的发生。

在近代中国,西方列强屡犯中国,主权沦丧,战争的灾难接踵而至,中国人民理应奋起反抗,毫不犹豫地投入革帝国主义的命的战斗,但基于中外力量的悬殊,此命又并不那么好革,如果只图一时之痛快,固执己见,则与认真负责无关。无论是道光一朝,还是慈禧时代,

无论是厌恶妥协的言官,还是社会舆论,人们宁愿不厌其烦地把琦善、曾国藩当作君主专制主义的替罪羊,也不会把词锋对着清朝最高统治者,好像最高统治者总是不会错的。对任事者来说,对外妥协既可以是卖国外交的一种形式,也可以是爱国外交的常规技巧,其中并无绝对的错与罪,只有当该妥协时不妥协,该抗争时不抗争时,才是值得追问的。但不管怎样,弱国的外交总是夹着尾巴做人,还费力不讨好,谁遇上这样的差使,谁就自认倒霉,处理天津教案的曾国藩便是一例。曾氏就在此案不久,在自责与他责的煎熬中加重病情,撒手尘寰。时隔十年,曾子纪泽赴俄谈判收回伊犁归来,在紫禁城养心殿接受慈禧召见时,就为代君受过的已故乃父说话:“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2]其词也哀,其理也直。

只要我们不是以某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来苛求历史人物,而是借助于“同情的理解”,进入研究对象的情境、物境与意境,重新体验他人的内心世界,从而再现其内心,体验其人的原意或处事方法,那么,不难发现,处理天津教案一事并不足以成为对曾国藩进行否定性的价值评判或定性分析的力证,除非后世研究者的学术立场与见识只能停留在当时的言官与社会舆论的水准,裹步不前。曾国藩的“拼得声名”,力保和局,何尝不是其爱国情怀在此时此地的艰难闪现。除非后世研究者就认定爱国之方仅有绝对反抗之一途。

综上所述,价值评判固然必须严格建立在事实评判的基础上,但并不是说只要事实评判没有疑问了,价值评判就迎刃而解了。价值评判既要坚持以事实评判为基础,也要注意事实与事实之间的某些相关性因素,清理历史的利害关系。历史场景之所以显得错综复杂,其中与历史事实的相关性因素较多关系甚大,而且许多相关性因素往往是互相交织,盘根错节。在近代中国,涉外争端频仍,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应当属于高于阶级利益、集团利益与党派利益的客观存在,究竟如何维护和保障它,怎样从国情出发,把国家与民族的利益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对于历史当事人,既需要耐心,也需要智慧;作为后世研究者,则需要从不同的时空条件出发,予以具体分析,光凭“一分为二”的思维方式与革命史观的价值标准是不够的。

唯其如此,历史研究的主要使命除了事实评判与价值评判,还有先于价值评判的事实与事实之间的相关性分析,以及各种事实的因果分析,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因果分析,等等,只有经过这样的分析程序,才有可能分清历史要素的主次、轻重与优劣,比较公正地行使价值评判的权力。至于历史研究是否应当在着力占有资料,认真把握事实评判,以及事实之间的相关性分析与因果分析之后,适当淡化原有的价值评判与定性分析,那也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议题。

[1] 纪昀等纂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五,史部一,史部总叙。

[2] Marion Leathers Kuntz & Paul Grimley Kuntz, *Truth in History: Waswo's ideological relativism vs.*

Kristeller's Empirical Objectivism, *Bibliothèque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44:3(1982:sept.), p.646.

[3] Marion Leathers Kuntz & Paul Grimley Kuntz, *Truth in History: Waswo's ideological relativism vs. Kristeller's Empirical Objectivism*, *Bibliothèque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44:3 (1982:sept.), p.647.

[4] 李凯尔特之所以把“科学”划分为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并把历史学放在文化科学里,其中一个重要依据是,历史学也属于需要借助于价值评定的科学。([德]H.李凯尔特《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转引自[波]耶日·托波尔斯基:《历史学方法论》,张家哲等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北京,第651—652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北京,第64页。

[6] (意)本纳尔多·克罗齐《历史和编年史》,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4页。

[7] 主张“过大于功”的一方乃年逾八旬的前辈师长姜铎先生。当时,我任教于西子湖畔,是他函约走我潇湘故里,一同参加此会,这位军人出身的长者还主动到后学的房间看望。如今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谦和豪放的姜铎先生早已仙逝,而与他互相讨论的情景历历如昨。

[8] 参见拙稿《曾国藩研究三题》,《史学集刊》1997年第3期。

[9]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2页。

[10]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8—379页。

[11]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页。

[12] 《太平天国史料》,第84页。

[13] 《东王杨秀清答英人诰谕三十一条》。

[14] (英)富礼赐《天京游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6册,第951页。

[15] 罗尔纲《〈太平天国人物〉序》,《浙江学刊》1987年第3期。

[16]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4页。

[17][18][19] 《曾国藩家书》,同治九年(1870)六月初四日、六月十四日、六月二十四日。

[20] 此数就大大超过曾国藩以二百两置妆奁嫁女的数目,其诚意与决心可见一斑。

[21] 许山河《论曾国藩与天津教案》,原载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3辑,转载湘潭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合编《曾国藩研究论文集》,《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增刊,1986。

[22] 曾国藩在与湘军老部将彭玉麟一函中就说得很清楚:“大抵此事在局中者,皆以中国兵疲将寡,沿江沿海毫无预备,而诸国穷年累世但讲战事,其合从之势,狼狈之情,则牢不可破。我能防御一口,未必能遍防各口;能幸胜一时,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敌一国,未必能应付各国。在今日构衅泄愤,固亦匪难,然稍一蹶跌,后患不堪设想者。”(《曾国藩未刊信稿》,《复彭雪琴侍郎》)

[23] 《曾惠敏公全集·奏疏》卷二。

(本文作者郭世佑,中国政法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湘军史》架构与曾国藩研究若干问题浅析

王 盾

笔者新著《湘军史》即将出版。另一史著《湘淮军政集团关系与近代中国》，预定2007年夏完成书稿。此前，另两部专著《湘学史》与《王闳运研究》早已完成书稿。现正开始《湘学与吴、粤、蜀学比较研究》。这几部近代史专著都以曾国藩的学术、事功及其对近代中国的重大影响为研究核心。恭逢盛会，谨就《湘军史》研究架构及笔者近代史专著数种中涉及曾国藩研究的若干问题浅析作学术研究汇报，向史学界诸位学者请教。

《湘军史》架构共五篇，四十二章，六十万字。是由编年、专论、通志、战纪、传略等五大部分有机组合的湘军全史。于2004年列入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立项。全书结论认为：湘学是湘军军事思想的哲学基础，湘军是湘学经世致用主旨在兵学（军事学）领域的实践；湘军的事功是湘学“理势统一”、“以势抗道”的学术思想产物；湘军是湘学在文化思潮机制运作中以经术为治术的典范；在传统儒学范畴里是内圣与外王的依存关系。研究湘军是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历史变革的重要学术枢纽。

《湘军史》第一篇《湘军编年》采用年鉴体裁。以年月为纲，以湘军大事纪为目，记述从清咸丰元年（1851）到清光绪廿八年（1902），即湘军建军前三年楚军江忠源入广西作战到湘军后期统帅刘坤一卒于江宁防区、清廷设立中央练兵处撤销勇营，五十年间的湘军活动。

第二篇《湘军专论》十题，以军事史为核心，从政治史角度切入，剖析湘军从创建、扩建到解构、衰亡全过程的内外互动关系，着重研究湘军政治属性由前期镇压农民起义、中期戡定叛乱到后期四次反侵略战争嬗变中“本质”的内在变化；论述晚清时段湘军军事政治集团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自立军革命、东南互保及辛亥革命等国内重大历史事件及收复新疆、甲申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庚子八国联军等反侵略战争中的重大作用，特别是对民国军阀混战、南北对峙、北伐抗战的深远影响，明确湘军在近代史上的军事政治地位。并采用比较方法，辨析湘军与清王朝统治集团、淮军军事政治集团的关系，纵论明末“闯献”起义与清末“发捻”起义的军事战略战术异同，评述湘军著作《湘军志》与《湘军记》的优劣偏颇，使若干涉及近代史的疑团得以澄清。

第三篇《湘军通志》十五题，全面排比、梳理爬剔湘军建设、扩充、收缩过程中的史实、制度与人事变革脉络，进行系统论述。资料颇为丰富：其中军系沿革、战斗序列、战略、军需、募遣、屯戍、惩黜、哗变、幕府、阅阅等十种专志，为已有湘军研究著述所无。例如：湘军

军系沿革志,对湘军五大主力(老湘军、霆军、吉字营、楚军、左系湘军)发展过程,纵贯详介;又如战斗序列志,对湘军历次战役的兵力配备组成,横列详介;又如幕府志对曾左两大幕府外若干将帅军幕作了详介;又如阀阅志对湘军主要人物后裔第二三四代人物作了介绍;再如募遣志对湘军兵力消长及战区、防区变化都作了详细介绍。

第四篇《湘军战纪》极为详实。共记述从蓑衣渡伏击到八国联军通州遭遇战等较大战役 114 次,其中镇压农民起义战役 70 次、戡定叛乱 28 次、反侵略战争 16 次。对湘军 6 次大捷(田家镇、嘉应黄沙嶂、尹隆河、金积堡、喀什噶尔、镇南关)及 4 次大败(三河、黄飘、二郎场、灞桥十里坡)均有极详细记述。

第五篇《湘军将帅》分 6 个层次:介绍湘军将帅传略,其中:统帅 4 人(曾、胡、左、刘);主帅 30 人(内战区、防区 25 人,兵种 5 人);统领 60 人;分统 150 人;营官 400 人;幕府 150 人;合计立传 1000 人。

笔者在《湘军史》全书、《湘学史·湘儒学案》、《王闿运研究》中关于王湘绮与曾左刘郭诸重要人物关系的论述中,及《湘淮军政集团关系与近代中国》全书纂述过程中,都曾触及曾国藩学术思想、军政、洋务、教育中存在的若干有争议问题,谨将解析浅见简介于次:

第一个问题是湘军的政治属性问题。

《太平天国史》和《湘军兵志》将湘军定性为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武装,即由地主阶级编练的、反革命最凶狠的军队。这是从阶级斗争观点出发,认定农民起义是社会发展动力所作出的结论。湘军镇压太平军革命与捻军起义确系镇压农民起义运动,军队性质定性可修正为维护封建统治的非建制地方武装,且只能限于湘军前期。对湘军中期戡定西北与云南回民动乱,其定性是有争议的,如果认定为回民动乱是反对封建统治的农民起义,则可按上述湘军前期修正定性;但如认定回民动乱是勾结外敌、背叛祖国,那就属于叛乱。从西北回乱史实看,金积堡马化龙、西宁马本源、马桂源与陕西白彦虎的叛乱证据是确定无疑的,尤以白彦虎叛逃出境后还勾结外敌入侵,实属罪无可赦。因之,湘军中期就不能按前期定性,应当修正为维护祖国统一、纳入建制的国家军队。至于湘军后期进行的都是反侵略战争,应当修正定性为反侵略的建制国防军。基于上列分时段剖析:笔者拟将湘军政治属性修正为:“由前期维护封建统治的非建制地方武装,在戡定西北、云南等地方叛乱后,逐步向保卫祖国统一和反侵略的建制国家军队嬗变。”是否妥当?尚需进一步研究,但原来铁板一块的定性势必打破。

第二个问题是曾国藩本人的定性问题。

《湘军兵志》对曾国藩的定性为“穷凶极恶残民以逞的大刽子手、媚外卖国的大汉奸、集中国封建文化的反动黑暗之大成的恶魔”。这是基于阶级斗争观点,采用“文革语言”所作的非学术性政治结论,很不科学。具体分析:曾国藩统帅湘军镇压农民起义这是历史事实,湘军前期维护封建统治的“事功”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不容翻案,但是,全面考察史实,曾国藩学术思想的核心是“经世致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制夷”,因之,在洋务运动、文化教育诸方面,已逐步转变为推动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现代化发展的先驱。是经世致用的理学家、复兴桐城派的文学家,从事功看是湘系军政集团的首领、洋务派的创建者与湘军前期统帅。必须补充的是,以发展观点看问题,关于曾国藩事功性质我们还应对曾国藩晚年言论行动与思想活动给予应有关注与剖析,才能全面评估

曾国藩的正确性,试举数例:

1. 咸丰十年(1860)八月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文宗出狩热河下诏湘军勤王,曾国藩与胡林翼以东南军事紧急,无力北援复旨推卸,议者认为只重湘军集团事功不顾君父忧危。实际上曾对战争形势与发展持观望态度,为保存实力,不愿火中取栗,王闿运即在此时献纵横之策,事寝未被采纳。

2. 同治元年(1861)僧王、胜保利用苗沛霖盘踞淮北,排斥湘军,曾国藩以需集中兵力,围攻江宁为由,从两淮撤军南移,清廷震骇,疑忌加深。

3. 同治二年(1863)安庆攻克后,曾国藩兄弟在安庆延请湘潭欧阳兆熊整理出版船山遗书,写序阐述船山思想,说明曾已开始宣传船山民族主义爱国思想。

4. 同治三年(1864)三月因江西牙厘案与江西巡抚沈葆楨争讼,朝廷护沈,户部卡曾,《年谱》遂以“握兵符掌利权为时所忌有功成身退之志”记述曾的心态变化。

5. 江宁攻陷,即遭清廷疑忌,僧王迅即遣富明阿来江宁探视虚实,曾被迫立即撤遣湘军避谤。

6. 平捻期间,因师老无功,屡遭劾议,曾懋雍正朝鄂尔泰公爵被削前事,自请削除封爵,虽朝廷慰勉,已可知曾具离心倾向。

基于以上史实,可知曾晚年思想并非坚持维护封建统治。

第三个问题是湘军攻陷太平天国天京后,立即开始大撤遣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曾国藩奏折与函牍公开宣称是“湘军暮气”。此事《湘军志》与《湘军记》都辨明不存在暮气。史学界则认为有三个原因:其一是曾氏防盈保泰,避免功高震主,用撤遣来缓解朝廷猜忌;其二是战乱十数年,湖南壮丁大量出征,赋税供饷匮乏,田园荒芜,城乡凋敝,下层兵勇盼望解甲归田休养生息,恢复农业生产,维持家庭生活;其三是东南财赋大多遭湘军卤获,兵无斗志,渴望衣锦还乡、买田置产。但是,江宁大撤遣后,湘军离开东南战区回乡,即由杨岳斌、左宗棠、刘典、刘锦棠等分批招募转入西北战区(详拙著《湘军史·募遣志》),从镇压农民起义作战转入平叛与反侵略战争。因此,笔者认为:湘军大撤遣的真实原因是曾国藩为了保存湘军有生力量,与左宗棠达成默契,改变湘军性质所进行的战略转移。这一结论,有待进一步证实,果真如此,则对曾国藩个人定性即需再作修正。

第四个问题是曾国藩为什么会寿命如此短促?

李鸿章死于光绪廿七年(1901)78岁,左宗棠死于光绪十一年(1885)73岁,曾国藩死于同治十一年(1872),仅62岁。从同治三年(1864)六月天京攻陷到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曾国藩死于两江总督任内,七年半时间,曾国藩遭遇了多种政治挫折:天京刚攻克就因幼天王突围逸走,擅杀李秀成及天京圣库三事,引起朝廷猜忌;此后平捻师久无功,讥劾交集、自请削爵;天津教案错处,外惭清议、内咎神明;湘军饷绌多处哗溃,曾国荃与官文矛盾,湖北军事屡败;湖南城乡动乱频发,淮军代兴处处凌逼;由两江调直隶再回两江,离家十年因平捻与天津两事不敢回乡、愧对父老,而长期外任封疆,拥大学士虚衔,未能进入中央政权,这些都使压抑了多年劳瘁的身体日趋衰弱,心态悲观,与赵烈文谈话有“吾日夜望死”之语。因此,导致过早患心肌梗塞死亡。

第五个问题是曾国藩与左宗棠的矛盾为什么始终不能化解?左宗棠由曾国藩、胡林